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福利国家的比较政治经济学

徐崇温 主编

[英] 托马斯·亚诺斯基 亚历山大·M·希克斯 著
姜辉 于海青 沈根犬 译



重庆出版社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福利国家的比较政治经济学

徐崇温 主编

F0-53
2/137
167

[英] 托马斯·亚诺斯基 亚历山大·M·希克斯 著
姜辉 于海青 沈根犬 译



HA006/13

重庆出版社

**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

Thomas Janoski, Alexander M. Hick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4 年英文版译出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福利国家的比较政治经济学**

[英] 托马斯·亚诺斯基 著

亚历山大·M·希克斯

姜辉 于海青 沈根犬 译

责任编辑 陈 慧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字数 331 千 插页 4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ISBN 7-5366-6353-6 / F · 311

定价: 26.00 元

献给我们在伯克利和威斯康辛的
政治经济学和方法论老师
以及南希、瑞安和纳特

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 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在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凯旋进军，还是遭遇挫折，都在相当程度上同是否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关。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的问题，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9 页）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序列上，社会主义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本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什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体现出这种优越性呢？就客观原因来说，这主要是因为 20 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还是一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就主观原因来说，则主要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因而体现不出社会主义

的本质，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和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在19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认为在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帮助下，像俄国这样拥有农村公社的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他又再三再四地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435页）。

列宁更把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看作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建设社会主义过程所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把资产阶级当作旧的无用的废物完全抛开的主张，列宁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2页）他还强调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的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同上引第171页）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又特别致力于破除那种离开了社会结构的总体状况，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抽象对比的观察方法，坚决实行利用资本主义，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虽然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但它毕竟在吸收外国贷款、引进先进技术等许多方面大大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伐。在苏联第一、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大批利用西方技术和设备的大型企业拔地而起，在苏联以16.8%仍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只是从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开始，由于斯大林认为干部、技术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胜利，这才开始收缩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使苏联的对外贸易额从1930年的

16.43 亿降至 1939 年的 2.7 亿卢布，外资企业逐渐被取消，外国技术人员纷纷回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又压缩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斯大林还在 1952 年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认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瓦解，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平行的世界市场中，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斯大林文选》下册，第 595 页）。这就割断了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使苏联更加陷入关门建设的状态。尔后，这种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理论和实践逐渐成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更把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贸易叫做“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正是这种自我封闭状态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大大地拉大了我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的差距，后来，又成为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终于在 90 年代初期陷于解体的一个经济上的根源。

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的时候，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题的新的时代高度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

而要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首先就要了解资本主义、特别是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在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于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调整：在生产力方面，它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把高新技术引进生产，使经济获得比较快速的发展，如果说，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创造了有史以来人类生产力的总和的话，那

么,从20世纪中期以来,它又创造了超过它自身在以前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它在归资本家私有的企业中推行所有和管理分离以及“雇员持股计划”却又实现有效控股;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它发展形形色色的工人参与决策和管理的制度,缓和劳资之间的冲突;在消费品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它广泛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福利国家”,缓解不断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在上层建筑方面,它建立系统的国家干预机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内构成一个争执、协商和妥协的结构,调节社会矛盾,避免社会爆炸。应当说,在这种变化的背后,资本主义的本质依旧,但面目已非。尽管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调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内进行的,它并没有解决同不断发展的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基本矛盾,相反地,这个矛盾还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着;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系列调整举措,又毕竟缓和了社会矛盾,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继续发展。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就苏维埃政权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资本主义当时的最新成就泰罗制问题指出:“它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操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列宁选集》第3卷,第3版,第491—492页)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的上述一系列新的调整举措也应当这样看,这里面,除了包含有我们需要摒弃的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伎俩和手段之外,又显然包含有我们需要借鉴和吸取的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不是一件没有风险的、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是因

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还是世界主题的转变,它们所改变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而只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共处和斗争的形式。资本帝国主义始终想消灭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把它们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轨道;过去它主要依靠拿起武器发动侵略战争来达到目的。现在,则主要凭借其在经济、科技上的领先地位,控制国际市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和接触,把它们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植起内应力量,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84年出版的《真正的和平》一书中,就明确宣告:“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使他们(指社会主义国家)参加我们两种制度之间的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会促进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我们同东方接触越多,就会使它受百方榜样的影响越大。这样做必然会加强那些正在促成演变的内部势力”。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也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消极因素,尽管同利用外国资本和科技加速发展带来的积极效果相比,毕竟要小得多,但要是不予正视,不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措施而听任其蔓延开来,却会形成严重冲击,遗害无穷,使社会主义变质成为资本主义的。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而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尊感和民族自信心。”(《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43—144页)而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要求我们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

正是基于这种为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全面、正确地了解资本主义的需要,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推出这套《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这套丛书以翻译国外学者研究当代资

本主义方方面面的论著为主,在适当时候再推出一些我国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论著。我坚信,在知己的同时又知彼,将有助于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抓住机遇,又经受考验,从而加快我们的发展,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世界发展格局中掌握主动权,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序 言

我们希望本书类似于像西达·斯科科普(Theda Skocpol)主编的《历史社会学中的视野和方法》那样的著作。这本书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形式,它围绕着方法而不是作者组织起来的,对具体政策理论的关注同于对一般观点的关注,对方法技巧的目标强调同于对模式的强调。但我们的意图仍然如此——把一广泛系列的方法引入到比较社会科学领域。同查尔斯·雷根(Charles Ragin)的“综合分析”概念相一致,我们认为本书把一广泛系列的比较、定量和确实是历史的方法结合在一起。诸多相互交织的方法使一个领域丰富了起来。我们希望我们的方法网既紧密又宽阔,足以把关于福利国家的丰富的新洞见包括进来。

本书的写作始于南方社会学学会年会的筹备计划之中,在1991年于杜克大学举行的“比较学家的新视野”会议上臻于成熟。都海姆、纽约和华盛顿三个地区的会议发起者为会议提供了大体相等的资助,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以这次会议为基础。首先,我们感谢杜克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爱德华·蒂亚金(Edward Tiryakian),他为

该课题研究的启动提供了最初资金。若没有他的帮助,该项目研究可能就无法起步了。其次,我们还要感谢约安尼斯·西纳诺格罗(Ioannis Sinanoglou)博士和欧洲研究委员会,他们提供了西欧研究专题小组资金的资助。第三,我们还要感谢威廉 V·D·安东尼奥(William V. D. Antonio),他从联合的美国社会学/国家科学基金会学科发展基金中为会议提供了资助。三处发起者为会议的举行和本书的形成作出了同样的贡献。

我们对下述这些促成和参加“比较学家的新视野”会议的人员深表谢意:北卡罗莱纳-查布尔希尔大学的彼得·比尔曼(Peter Bearman),杜克大学的加里·格里菲(Gary Gereffi),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拉里·格里芬(Larry Griffin),佛罗里达州大学的拉里·艾萨克,新墨西哥大学的米古尔·科赞尼维茨(Miguel Korzeniewicz),杜克大学的彼得·朗格(Peter Lange),北卡罗莱纳-查布尔希尔大学的菲利普·奥康内尔(Philip O'Connell),西北大学的查尔斯·雷根(Charles Ragin),爱摩利大学的里查德·鲁宾逊(Richard Rubinson),加利福尼亚-欧文大学的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康奈尔大学的戴维·斯特朗(David Strang),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的乔治·切伯利斯(George Tsebellis),密苏里-圣路易斯大学的奇卡科·尤苏伊(Chikako Usui),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的迈克尔·沃勒斯坦(Michael Wallerstein)。我们特别感谢查尔斯·雷根,他参与了会议讨论并提供了论文,帮助我们请到两位重要与会者。杜克大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系的研究生们在会议上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接待了每一位关注方法和内容的论文提交者。我们也要感谢下面这些讨论人员:迈克尔·阿尔瓦雷斯(Michael Alvarez),菲利普·阿特金森(Phillip Atkison),基希·乔伊(Jihee Choi),阿黛尔·卡明斯(Adele Cummings),斯蒂芬妮·方达(Stephanie Fonda),法布里斯·拉博科(Fabrice Laboucq),帕特里斯·勒科里克(Patice LeClerc),布莱恩·莱昂德(Bryan Lyond),P·A·麦克马纳斯(P.

A. McManus),斯蒂芬·拉塞尔(Stephen Russell)和文斯·萨拉查(Vince Salazar)。最后,我们感谢朱迪思·狄龙(Judith Dillon)对会议的筹划安排,感谢阿黛尔·卡明斯(Adele Cummings),朗达·道拉斯(Rhonda Dollas)和布里吉特·尼亚里(Britte Neary)在后勤上提供的支持。

我们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丛书编辑彼得·朗格(Peter Lange)和社会科学编辑艾米莉·卢斯(Emily Loose)。彼得和艾米莉做了适时的编辑性工作,彼得还参加了会议的讨论。甚至在早期审阅不太令人鼓舞时,艾米莉·卢斯也提供了准确和乐观的工作投入。

我们还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四位不知姓名的审定者,他们提供了有益和关键的反馈意见;以及七位与资助该项目有关的审定者,他们提出了重要建议。最后,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的安比·赖斯(Amy Rice)和朱迪思·迪利昂(Judith Dillion)加入进来,经常从多种风格和编排中重新构建我们的图表。

本书部分地献给在伯克利市和麦迪逊市的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和方法论老师。尽管许多老师都作出了贡献,但我们还是特别感谢在伯克利市的哈罗德·威伦斯基(Harold Wilensky),他一直是福利国家分析的推动力量,并经常警告要谨防方法论的教条主义;另外还要感谢在麦迪逊市的70年代(1970s)社会学系每周的“社会组织”和“方法论”研讨会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他们都是值得推崇的知识多元论者。

本书作者

- 詹姆斯 E · 阿尔特 (James E. Alt) 哈佛大学
苏珊 · M · 卡尔森 (Susan M. Carlson) 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
约翰 · R · 弗里曼 (John R. Freeman) 明尼苏达大学
亚历山大 · M · 希克斯 (Alexander M. Hicks) 爱摩利大学
拉里 · W · 艾萨克 (Larry W. Isaac) 佛罗里达州大学
托马斯 · 亚诺斯基 (Thomas Janoski) 杜克大学
奥利 · 坎加斯 (Olli Kangas) 芬兰土尔库大学
菲利普 · J · 奥康内尔 (Philip J. O'Connell) 北卡罗莱纳大学
(查珀尔希尔)
经济和社会研究所(都柏林)
- 玛丽 · P · 马西斯 (Mary P. Mathis) 爱摩利大学
查尔斯 · C · 雷根 (Charles C. Ragin) 西北大学
戴维 · 斯特朗 (David Strang) 科内尔大学
奇卡科 · 尤苏伊 (Chikako Usui) 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利国家的比较政治经济学 / (美)托马斯等著;姜辉,于海青,
沈根犬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9

ISBN 7-5366-6353-6

I.福... II.①托...②姜...③于...④沈... III.政治经济学—
研究方法—文集 IV.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0791 号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 ◇人民的资本主义
- ◇资本主义的幽灵
- ◇利害相关者资本主义
- ◇论全球化的区域效应
- ◇当代资本主义
- ◇国家的多样性和全球的资本主义
- ◇现代公司和美国政治思想
- ◇公司经营与资本家阶级
-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 ◇联盟资本主义--日本企业的社会组织
- ◇福利国家的比较政治经济学
- ◇西方国家的一种新治理方式--社会民主主义
第三条道路研究
- ◇转变中的福利国家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福利国家的比较政治经济学

[美] 托马斯·亚诺斯基 亚历山大·M·希克斯 著
姜辉 于海青 沈根犬 译



重庆出版社

内容简介

政治经济学中比较和历史研究的新方法，至今还没有被人们纳入到整体的框架中，或者还没有被视为比较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领域，新近的大部分著作都强调了历史的或定性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范围广泛的定量研究。现有的关于比较方法的教科书，都是在多数新方法被人们广泛使用之前编写的。因而本书论者的研究在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填补了空白。在导论中，他们对比较研究过程和研究者在过去的十年里所使用的方法进行了总体概括。在此后的章节中，该领域中的著名学者分别阐释了特定的方法，并通过将每一种方法应用于发达工业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中来对其加以论证。在结论部分，托马斯·亚诺斯基和亚历山大·希斯克阐明了“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个含混的概念，并指出了福利国家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在未来几十年内可预期遵循的四个发展方向。